抗日初期柳州文化界的救亡活动

——记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

陈雄子

抗日战争时期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从一九三八年冬至一九三九年夏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以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为中心的各种宣传活动。一是从一九四0年初至一九四四年夏为一个时期。这时期主要是以“抗敌演剧四、五队（原为一、九队）”为中心的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到统一战线上开展抗敌的活动。本文所追述的是第一个时期的柳州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概况。

一九三八年六月，我从广州疏散来柳州。因常为《柳州日报》写些短稿，认识了该报的主要编辑梁琴生和编辑彭树椿。八月间，我征得梁彭两编辑的同意，在《柳州日报》第三版要了半版篇幅编辑出版每周一期的文艺性《前哨》副刊。这副刊虽然水平还是很低，可是由于是一般青年学习写

作的园地，内容又是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所以颇受青年的欢迎。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广西大学农学院教授乐嗣炳，并蒙他向龙城中学校长高天骥推荐，被聘为龙中教师。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西南各地开展保卫大西南的活动。此时《前哨》副刊在《柳州日报》登载了一个“召开柳州文化界保卫大西南座谈会”的通知。座谈会地点在中山东路一间小学。届时到会的约三十多人，有西大农学院师生，市各中学师生、小学教师，亦有机关单位职员。座谈会开始前，在座一个县党部来人阻止座谈进行，说是事前这个集会没有申请县党部批准。经过与会者与之一番论争，县党部来人终而缄口无言。座谈中，大家对当前抗日救亡形势进行漫谈，认为柳州文化界必须和全国各地文化界一样行动起来开展保卫大西南活动。最后作出筹备组织“柳州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下简称“文协”）的决定，以当天参加座谈会的作为基本会员。并推举黄振璇（西大农学院教师）、陈显达（民团指挥部政治指导员）和我三人为筹备人。黄、陈负责组织工作，我负责起草协会章程。十一月间，“文协”筹备工作完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中山东路一间停业铺面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除基本会员外，增加了一些由基本会员所邀的人。可是却来了这些不速之客：航校政治部主任、指导员以及柳州知名的“中统”陆树珊等等。大会推举乐嗣炳主持，通过章程之后，进行“文协”理事会的选举。那些不速之客也来领选票。为防止不速之客企图渗入“文协”领导机构中，乐嗣炳和我们几个筹备人商量，决定向大会宣布会后开选票。经大会同意并推举三个筹备人负责开选

票工作。

选票比较集中在我们原来预定的人。不速之客的票我们基本将它废掉，只有航校政治部一个指导员的，藉以堵他们的口。理事会理事七人，分工是：乐嗣炳为理事长（解放后才了解乐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共组织，后因故失去组织联系，七十年代落实政策时，他在任职单位复旦大学申请恢复党籍），李伟诗负责总务部，陈显达、黄振璇负责组织部，我负责宣传部，航校指导员，我们推他负责服务部（这位理事感到自己负责的是可有可无部门，参加了一次理事会就不辞而别了）。为加强理事会工作，加聘孙文骏为组织部助理，刘纪元，吴焯才为宣传部助理，查仲轩为总务部助理。另外，还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女小学教师为脱产干部（孙、刘为柳州邮电局职员，近年来才了解，他们当时都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青年。吴是广西测量局绘图员，是木刻爱好者，曾在《新华日报》、《群众》杂志发表过作品。查是当时《柳州日报》记者）。“文协”地址设在福建会馆（今柳州剧场），与《柳州日报》一起。会馆是一间停了业的剧场，不久《柳州日报》另迁，整个会馆为“文协”所有。场地宽广，有现成戏台，演剧、开会都方便。

“文协”正式成立后，重点工作是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首先是“开辟宣传阵地”、“组织宣传队伍”：一、将《前哨》副刊改为《救亡周刊》。二、成立“救亡阅览室”。阅览室设在培新路一间未开业的商店，摆设了一些抗日的书报杂志，定时开放给群众阅览。开放不久，由于其中有一些进步书刊，如《论持久战》等，受到陆树珊出面干涉，要我们

把进步书刊撤去，另换入他送来的一些小册子，主办阅览室的刘纪元和我商量，决定将阅览室关闭，免得给陆利用。三、吸收京剧团、桂剧团、粤剧团为集体会员，以他们几个剧院作为抗日救亡宣传阵地之一。此外，还请他们各义演了一晚，筹集资金开设了一所“救亡剧场”。这个剧场设在福建会馆，即“文协”会址内。四、组织“救亡话剧团”和“救亡歌咏团”。话剧团成员主要是龙城中学师生。歌咏团有四个，一是以小学教师为基础的，二是以龙中学生为基础的，三是以西大农学院学生为基础的（领导人是华恕子、刘文庆），四是以机关青年为基础的。话剧团联合京剧团、桂剧团、粤剧团及歌咏团曾于一九三八年底在体育场（现市统战部后面）作抗日宣传演出了一个晚上，歌咏团还经常上街和到各剧院、电影院利用开演、开映前以演讲和歌咏形式进行二、三十分钟的抗日宣传。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一月初，“文协”发动了一次反汪（精卫）卖国的宣传活动，乐嗣炳理事长和几个理事商量，推举我写了一篇不署名的讨汪短评在《柳州日报》发表，乐本人接着写了一篇揭露汪精卫、陈璧君卖国罪行的短文在“救亡周刊”发表，其后又在街头贴出反汪壁报。这一活动引起柳州国民党当局的反感，先是民团指挥部黄指挥官打电话到《柳州日报》查写反汪文章的人，后是中统派人撕毁街头反汪壁报。在这期间，“文协”在“救亡剧场”举行了一次规模颇大的时事座谈会，会上乐嗣炳作了题为《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讲话。记得当时有一位从前线回到柳州的学生军，姓吴的，平南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讲了话。一九三九年春节，“文协”还参加了

柳州市各界慰劳抗日军属的活动。“文协”和广西学生军同一组。组长是学生军一位姓黄的指导员（广州人，中大毕业，后曾任《广西日报》副刊编辑）。

一九三九年春，乐嗣炳被人向广西省府告了一状，被迫离开西大，政治处境困难，“文协”理事会乃增选龙中校长高天骥为理事。乐辞“文协”理事长，推选高为理事长。在这时候，上海“八·一三”歌咏团、上海话剧团、广东儿童剧团等相继来柳，“文协”十分欢迎这些从沦陷区来的坚持抗日救亡战友，接待他们住宿在“救亡剧场”，并供应他们两餐伙食。为充实“文协”理事会，以利开展工作，补选了章枚（“八一三”歌咏团团长）、蒋柯夫（上海话剧团团长）、谭星（广东儿童剧团团长）等为理事会理事。并聘请上海话剧团的姚岳（又名姚平）、樊康为“救亡剧场”专任干事兼导演。陆新生为“救亡歌咏团”指导。其中姚岳由龙城中学经费开支每月给予一定生活补助费（四二年我在桂林见到姚，据说“文协”结束后他曾去过香港一段时间，后转回桂林与朱琳等组织“新中国话剧团”。当时他还邀我去看朱琳主演的《钦差大臣》话剧。解放后曾有人说他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已经去世）。

上海、广州进步文化团体来后，“文协”的抗日救亡宣传十分活跃。以龙中为基础的救亡歌咏团与广州儿童剧团联合在街头演了不少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八一三”歌咏团在“曲园”剧院和“救亡剧场”，公开演出了几场“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由章枚指挥，激荡着广大民众的抗日热血。此时，“救亡剧场”开始作售票话剧

演出，除开晚上场外，有时也开下午场。目的是以门票所得作为外来文化团体的生活补贴。演出了一些独幕、二幕短剧，还由以龙中师生（彭、刘老师两夫妇，莫真权、陈美云等同学）为主的“救亡剧团”演出了一出大型话剧《塞上风云》，宣传汉蒙民族大团结一致抗日，主角是彭、刘老师两夫妇和上海话剧团的来演，演出很成功，下午和晚上几场都满座，宣传效果很好。记得一九三九年二、三月间的一个晚上，我国名戏剧家彦祥去重庆经柳，特意来访“救亡剧场”。他说目前我国话剧自己有剧场的售票演出的不多见，对“文协”的努力十分赞赏，鼓励我们努力逐步改善发展。遗憾的是“剧场”收入售票毕竟有限，维持二十多人的生活十分困难。统计几个月间收支不敷三千来元。这款项全是由高天骥理事长垫支的，最后无人偿还就一笔勾销了。由于生活困难，外来三个文化团体于四月间相继先后离柳。“剧场”只留姚岳一人，“救亡剧团”是业余剧团，不能经常演出，这样，“剧场”逐渐冷落下来，没有象过去几个月那么热烈了。一九三九年五月间，姚岳协助龙城中学全校师生下乡抗日宣传巡回团排演工作之后也离开柳州他去了。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上午，日寇敌机十余架入侵柳州上空，从鹧鸪江上空开始分成两队，一队沿现在区二安、针织厂、锌品厂、公园、解放南一带至马鞍山上空；一队沿现在柳钢、贮木场、黄村、五一路（过去叫大树脚）一带至马鞍山上空，平行无目标地密集丢下大量炸弹与杀伤弹进行疯狂轰炸，许多建筑物受到严重摧毁，无数无辜市民惨重伤亡，尤其是公园与连塘路大树脚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龙中

抗战时期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迁柳复课的经过

黎远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寇侵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于日寇。香港不少的学校和不甘心当亡国奴的知名文化人士，都纷纷跑进内地复校和寻找工作，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贡献。香港私立华侨工商学院就是这时迁到柳州。我是从自己考进这间学校知道的。

私立华侨工商学院虽然设在柳州，但是在桂林招的生，当然在柳州也招了生。因为，当时桂林事实上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除陪都重庆以外，就数桂林了，成为大后方政治和经济的中心，特别是誉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每当寒、暑假时，特别是秋季始业时，全国著名大学都到桂林招生，例如西南联大、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岭南大学、湖南大学、四川大

（紧接一版） 与“文协”会址都在此次大轰炸中受到严重轰炸，满目瓦砾颓墙。龙中从此迁至鹧鸪江临时草盖教室上课。“文协”既失会址，又失去支持活动的主要人——“龙中”师生，而理事会理事又星散，因此各种活动从此停顿，组织亦无形解体。

1987.9